



现代制度主义 经济学宣言

〔英〕 G. M. 霍奇逊 著

勾以斌 等译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

〔英〕G. M. 霍奇逊

向以斌等 译校

新登字(京)159号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

〔英〕G. M. 霍奇逊 著

向以斌等 译校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70千字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 7-301-01599-2/F·139

定价: 8.90元

前 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出版活动蓬蓬勃勃而外,经济理论仍然处于一种可怜状态。其主要标志是,主流理论不能对许多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未能开出可以明确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药方。

拿对英国经济相对衰落的理论解释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一致的看法,而且许多说明都简直是不可置信的。其中,现行最突出的一种解释是,工资水平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导致了费用过高,从而在世界经济中缺乏竞争力。

然而,只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假定理性的工人会在健康的经济中无视其长期利益而保持“太高”的工资,这种理论就必然遭到反驳。这是由于“强制的”工会,还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抑或由于“高”失业带来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并没有得到确证,而其涵括的现象也常常并不是英国所独有的。因此,这些辅助性假说仍然争论不休,不可能作为解释英国相对衰落的一部分而为人们普遍接受。

在令人信服地解释西德和日本经济的巨大动力,或者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绝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出现停滞状态方面,正统理论同样是不成功的。所有这些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比英国高,这就对把工资作为问题的根源这个一般假定提出了疑问。至于正统派中的其它解释,也是令人沮丧的。例如,很有影响的《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的编委们在谈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问题时总结说:“尽管对这种下降作了大量研究,但它的原

因基本上仍然是个谜。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中，爱德华·丹尼逊考察了 17 种不同的假说，并作出结论认为，单个的假说或几个假说的组合，只能解释下降的很小一部分”。（布伦纳德和佩里，1981 年，第 VII 页）在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经济学正统派的共同的中心地带中，解释基本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这个微乎其微的成就，是整个经济学惨状的一个缩影。

顺便说一下，在遇到这种理论问题的时候，正统派会立即考虑解释问题的市场方面，关心工资和费用，而常常忽视生产组织和工作的技能与实施。可是，如果我们采取不同的观点，则能看到，假若生产组织的完善导致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更高的产出，那么较高的工资并无不可。在此基础上可以证明，工资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的而不是负的相关关系。与此相反，正统派坚持其一面之辞，假定厂商是一个黑箱，直接对费用和市场压力的变化作出反应。正统派不仅是不可置信的，而且还令人鼠目寸光。^①

检查一下学术杂志，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可经济学家们设法从他们的理论宝库中得出的政策却出奇的简单，并且特别受过去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一开始便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如今尽管具有了高度复杂的形式，但理论与意识形态依然本末倒置。

例如，在争论公有制与私有制和计划与市场的时候，经济理论通常比左派的、中派的或右派的整套传统意识形态强不了多少。整套的理论主要是用来为合理性提供一件外衣和作为诱惑重要消费者的经济学建议。执政或在野的政治家们因而也就能巩固他们的偏见，并且用某些学术外衣把他们伪装起来。

经济学家从来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意识形态，事实上也不要期望他们会去努力地这么做。但是，科学尾随一时的政治风尚总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而当意识形态非常拙劣时，这样的科学就

更难让人接受。许多这样的拙劣意识形态已经受到了对它们的关键思想产生破坏性作用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被经济学行业中的许多人鬼使神差地忽视了。

除了滥用意识形态而外,经济理论还一直竭力用不充分的学术根据来寻求各种经济问题的新答案,虽然先前的经济政策始终不见凑效。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失业仍然出奇的高,即使象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工业国家,贫困者也仍大批存在,而持续不断的饥荒则一直缠绕着不发达国家。不过,这些问题并不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

相反,主流经济理论经常主要当作理论家的一种艺术博奕,并由那些长于利用这种技能和能够按照那些常常是荒谬的形式和风格为杂志撰稿的人获得学术成就奖励。把数学形式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术语混合在一起的著作,将比直接公开地研究探讨当代紧迫问题的著作具有更多的出版机会,并变得“可尊可敬”。

作为例子,可以看一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毋庸置疑的战后最著名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保罗·萨缪尔逊(1962年,第1页)的下述自觉的自我谴责:

我的学术界同事研究的问题……就是诸如福利经济学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大道定理和密切包络(*osculating envelopes*);莫萨卡—希克斯式的明柯夫斯基—李嘉图—里昂惕夫—梅茨勒矩阵中的非替代关系;或者在局部受冲击的拓扑空间和容模当量中存在平衡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平衡预算乘数。

看来这是经济科学中最高水平的形式主义。在较低水平上,学生们按照有些重复的阶段循序渐进地被授以这种形式主义。整个过程具有延长的宗教入门典礼的色彩,在此过程中,未来的教士要洗心革面,抛掉纷繁污秽的外界尘世。正如尼尔·凯(1984年,第188页)所指出的:“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须足够

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

在一部人对理论的象牙塔沾沾自喜的同时，其他一些人则全都强烈希望在意识形态的讨伐中以他们的经济理论作武器。例如，随着新保守派在本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强盛，经济理论、甚至特别是那些最抽象的经济理论，经常作为削减公共开支和扩大私人经济与市场竞争的学术根据。

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为这种保守主义信念的一个牺牲品，是对我们当今时代的一种残酷讽刺。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如果没有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的“纯理论”作背景，就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插足高级公共领域。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系列人物，他们提出了广泛扩大市场关系与私人企业的建议，并根据相互依存的局部研究敦促尽可能缩减公共支出。新保守派的思想还得到了由公共基金赞助的学术机构的许多其它重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类研究开始告别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可以说，这种思想正以这种方式体现一种职业的自杀。

理性预期假说是一种特例，这种假说实际上假定每个人都基本上懂得基本的经济模型。这种理论意味着经济学家几乎提供不了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已假定每个人都大致知道经济如何运行。可是，经济学家们全都热切不已，以至越过了上述这种悬崖峭壁。理性预期模型方面的少数未遭批评而又深奥的出版物，现在已经成了升迁为经济学教授的最佳票证。诚然，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选择自己的信仰的权力（如果这些信仰与所选定的研究恰好一致则尤其如此），但是，谁都没有权力用华而不实、用起来有害的思想使千百万非经济学家陷入贫困潦倒的窘境。当今的经济理论状况即使不是如此悲惨，也是十分滑稽的。

经济理论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很快或轻易地改变，也不会单靠经济理论家们再信笔涂鸦一通而改观。但不管怎样，所有经济学

家都有义务考察这门学科的不完善情况,放一放那些学术游戏,认真解决一些经常被习惯地忽略掉的重要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轻易能找到的,本书也不会自称提供这些答案。不过,本书将带着对其它理论解释有所助益的观点,力图考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传统理论是受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继承下来的、落后的、理论上不可接受的个体主义观点支配的。

本书的主题是制度、社会实践和历史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影响。因此,认为本书或其它任何著作是初创性的,都将是自相矛盾的。应该感谢的是在它的创作过程中那些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作用。

在这本书中,读者将能回顾几个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学派。首先是后凯恩斯主义,包括象琼·罗宾逊和乔治·夏克尔,尤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自己的著作。第二个是制度学派,包括象索尔斯坦·凡勃仑这样杰出的人物,但也包括象卡尔·波拉尼这样一些不很受重视的人物。第三是马克思的著作,尽管琼·罗宾逊和其他一些人作了努力,但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仍然被大大低估了。

此外,本书还包含象行为学派——由赫伯特·西蒙领导——这样的重要学派和象弗兰克·奈特与约瑟夫·熊彼特这样不归属任何学派的重要人物。虽然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观点各异,但本书提出的他们的影响是不应否认的。本书冒昧地力图采取折衷主义的方法,把其他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综合起来,其中既包括对新古典理论的思想的批评,也包括其它理论解释中的有用部分。

认为本书是初创性的之所以错误,还有第二大原因。本书的中心论点虽然明显是从正统经济理论出发的,但它也依赖于其它一系列理论传统,即社会学、政治科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传

统。这些不同的学科对几个关键问题的解释是一致的或近乎一致的,特别是它们往往明显不同于主流经济理论的解释。

例如,除了少数例外,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和心理学中的国际舆论观点似乎表明,当事人并不象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设定的那样“理性”。因此,正统派“经济学”的理性加农炮被其它学科广泛地抛弃了。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学科仍然兴高采烈地闭目不视。由于经济学家们声称他们能抛开其它社会科学的成就而理解经济现象,社会科学之间的隔膜正在加强。《华尔街杂志》对胡佛研究所罗伯特·霍尔的一次访问捕获了这种孤高自傲的观点,访问者发现,“当(受访者)说只要他在经济学文章中一看到‘社会学的’这个词就不再读它时,受访者反映了他的同事的态度”。②

本书论点的进步作用,并不是主张对正统经济学的假定作“新的”一轮批驳,而是表明与其它任何研究相比,它的理论假定是多么苍白贫乏。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象初看起来那么简明,一方面是因为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回顾与总结,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它学科尽管在其它重要问题上具有一致看法,但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激烈的内部争论。

但是,不应认为本书所作的是对经济学本身的攻击或反对。这里抨击的目标是现行的正统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本身。在经济学专业中,明显地存在着把非正统的研究方法或思想流派作为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东西而忽视的倾向。这种反多元主义、或比较严重地说学术法西斯主义,不管其好坏,都是与一门自认为伟大的“自由的”学派的学科不相称的。本书的另一目的是依靠广泛的文献努力确立其它研究方法的合法性。

当然,要对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领域作出精确的定义和划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通常总是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经济过程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的。③

新古典理论包括：

1 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的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 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通现象认识的分歧。

3 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在最近 20 年中，在许多最高档次的经济学杂志里，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正在日益增加。但是，由于受这些杂志的编辑方针的限制，这些批评在范围上常常是狭窄的，在方式上常常是形式主义的。如果最终要建立取而代之的理论，就必须在可以证明新古典理论的许多解释对大多数这类批评是脆弱的同时，建立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本书就是想根据不同的激进的思路为发展经济科学出一份力量。它不可能自认为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新理论。这种任务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甚至也不大可能由一本书来完成。本书应被看作作为一个路标，它指示出值得努力的方向，而不应看作是通往希望之地的完整路线图，也不应视为希望之地的概观。

新古典理论虽然身受重创，但它还是拓宽和加深了它的范围，扩展了一系列新问题，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它的特征。过去对新古典理论的许多抨击都是想置之于死地，但结果是正统派只采纳了很少一点点意见，大多数东西依然如故。这种情况表明，较之那些想置之死地的批评，新古典范式的缺陷更具有根本意义。

例如，皮罗·斯拉法的著作(1960 年)和本世纪 60 年代的资本理论论战，成功地揭露了新古典总生产函数中致命的逻辑矛盾。^④可是，正统派不是无视这些问题，就是把它的重点转移到这种理论的非加总的解释上。新古典理论在经受这场毁灭性抨击后

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生命力表明，它的“硬核”思想应该到别处去找。它们不在它的夸大的加总行动中。

因此，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是重点考察新古典正统派最深层的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根本问题还没有引起与之竞争的思想派别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在正统派的批评者中间存在着一种可以理解、但最终等于自打嘴巴的倾向：他们想发展出在某些(重要)方面与主流理论不同、但却仍与之共用某些核心假定的取而代之的形式模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凯恩斯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建模传统正是以这种方式低估了凯恩斯的经济学，模糊了它们对正统派的根本性突破。只有琼·罗宾逊、保尔·戴维德森和少数其它人仍保持着凯恩斯在世时的根本要旨。

最近，在马克思主义中形式主义也得到深入发展，也运用对策论和其它数学工具。^⑥这类文献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较之于原教旨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僵死的教条的做法，它的分析的严格性是清新悦人的。但是，它利用了与新古典正统派没有实质区别的、与理性、知识和均衡有关的核心假定。抛开激烈的言辞，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主流理论的另一种说明，它仍然带着主流理论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以及关于经济过程的机械模型。与我的许多同事相反，我并不认为这种发展全是积极的，也不认为它能使马克思主义摆脱理论困境。相反，这是继在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全盛期后，它的内核衰退的一个信号。具体地说，这是逃避棘手的现实世界实际问题的另一种形式主义，是向看来对政策无用的学究主义的退却。

本人之所以撰写此书，部分地是由于对上面概述的发展的失望，其中既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也包括“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形式主义的解释。当我把我的大部分学术青春花费在令人欣喜的后斯拉法主义的价值理论上之后，我开始相信时

间是如此宝贵，这样的问题居然可以让人忙乎一辈子。

激进的价值理论家和正统派的许多其它批评者忽视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人类当事者的性质与理性的限度。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某些解释乐于采用这方面的正统公理，同时用其它假定来显示其与主流理论的区别，其中有些假定是相当肤浅的。但是，取新古典正统派而代之的激进的新理论，归根结底不可能总是避免联系社会关系和制度的经济意义建立新的关于人类当事者的理论。本书如果能使人们确信这种任务的迫切性，那么，在我看来它也就不算失败了。

要说明本书的研究与我以前的著作有什么联系，确实是太令读者乏味了。在此我只愿简单地指出，本书产生以前的研究，使我对心理学对经济分析的价值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观点，使我抛弃了认为心理学必然与个体主义的或拙劣的自然主义的观点相联系这种似是而非的偏见。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范式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对未知的、有用的材料的发现。事实上，本书注意了把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之研究与它们的自然的和生物的环境联系起来，而没有采用可在社会科学的许多解释中发现的、有关社会或经济的“封闭的系统”观点。

这或许与我以前的做法有些相反，但我将通过这种家丑外扬让热心的读者和批评者进一步作出抉择。在本文结束以前，我最后想说的是，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我无疑地宁可在正确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和开拓，也不愿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执迷不悟。

巴顿·穆尔

于诺森伯兰

注 释

① 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鲍尔斯、大卫·戈登和托马斯·韦斯科夫最近对美国经

济萧条的研究，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劳动过程文献的影响，也受到了其它制度主义研究的影响。他们用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计量证明，对生产率下降作出了似乎很有道理的解释。

② 《华尔街杂志》，1985年12月26日。

③ 托尼·阿斯普罗莫戈斯(1986年)对用“新古典的”这个术语描述主流理论提出了质疑。然而，这个术语已被广泛运用，即使可能也很难把它从文献中删去，因此这里仍然沿用。而且，这里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包含了这里所描写的各类经济理论，从而避免了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时所遇到的困难。不过，这个定义还不足以宽泛到把奥国学派也列到新古典一类，由于奥国学派反对均衡理论、特别强调知识和经济过程，所以应该把它单列出来。

④ 对这次论战的精彩总结，见乔弗·哈考特(1972年)。

⑤ 这种矫揉造作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例子，见约翰·罗默(1981年)。同样，斯拉法的线性分析的某些发展，而不是(象斯拉法自己的著作)所提出的“对经济理论批判的序曲”，被认为是新的取代范式的或多或少恰当的基础。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斯拉法的分析中，理性、知识、不确定性、以及整个时间的过程，这些问题均被忽略了。正如乔弗·哈考特(1985年)所表明的，琼·罗宾逊在其最后几年中实际上已认识到了这些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虽然她的追随者把这些言论看作是她后期生涯中的瑕点，但实际上这似乎证明她一直具有深入的自我批评的能力，直到1983年逝世前几个月，她的大脑还仍然具有生动的分析能力。

(陈义、杨岳全译)

目 录

前 言	(vii)
第一章 导言与提要	(1)
第一节 批评发展的轨迹	(2)
一、当前的理论背景	(2)
二、信息问题	(3)
第二节 一些考察	(5)
一、主观主义与制度主义	(5)
二、过程与系统	(7)
三、决定论、目的与选择	(9)
第三节 系统的观点	(11)
一、偏好与技术的内生性	(12)
二、系统观点的重点探讨	(17)
三、经济学与系统观点	(19)
第四节 范围与纲要	(21)
一、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命运	(22)
二、本书纲要	(25)
第二章 方法论和假设论	(29)
第一节 对新古典学派方法论的辩护	(30)
一、弗里德曼的方法论	(31)
二、实践中的方法论	(33)
三、弗里德曼的批判者	(34)
四、工具主义者的解释	(36)

第二节 经验主义及其它学派	(38)
一、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	(38)
二、卡尔·波普爵士的证伪主义	(41)
三、对波普方法论的批判	(43)
第三节 方法论的命运	(46)
一、预测及其它观点	(46)
二、规范方法论的局限性	(48)
三、尚待评价的范围	(49)
四、尚未说明的证据的重要性	(52)
第四节 附录：弗里德曼与最大化假设	(54)
第三章 在个体主义方法论背后	(61)
第一节 什么是个体主义方法论	(64)
一、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思考	(64)
二、人的有目的的行为	(65)
三、因果性和目的	(69)
四、关于目的的心理学区分	(70)
第二节 评论和提示	(73)
一、自发性和不存在性的解释	(73)
二、无休止倒推的问题	(75)
三、整体和部分	(78)
四、结束语	(83)
第四章 最大化假设	(88)
第一节 批评最大化假设的功用	(89)
一、显示性偏好及其它	(90)
二、“进化”论	(91)
三、对最大化的其它理论批评	(94)
四、对最大化的经验批评	(99)
五、对批评的评价	(102)

第二节 手段一目的框架问题·····	(110)
一、目的和手段·····	(110)
二、适应性目的·····	(112)
第五章 理性主义的行为观·····	(118)
第一节 最初的批评·····	(121)
一、早期的批评·····	(121)
二、原因和推论·····	(122)
三、理性主义者一个可能的反应·····	(124)
第二节 认知和心理的层次·····	(126)
一、无意识过程·····	(126)
二、认知理论·····	(128)
三、意识的多重层次·····	(130)
四、信息太多和太少·····	(133)
第三节 结束语·····	(136)
一、理性主义者的困境·····	(136)
二、结论·····	(137)
第六章 行为与体制·····	(140)
第一节 认知理论的影响·····	(142)
一、认知、文化与社会·····	(142)
二、认知理论与主观主义·····	(144)
第二节 制度的重要性·····	(147)
一、行为与制度·····	(147)
二、习惯·····	(149)
三、惯例化和制度·····	(155)
四、惯例、制度与信息·····	(157)
五、正统派和制度·····	(160)
六、博弈论和制度·····	(161)
七、自发秩序·····	(164)

第三节 结论	(165)
一、累积不稳定性的可能性	(165)
二、制度经济学的进化论特征	(167)
第七章 契约与产权	(175)
第一节 交易与产权概念	(176)
一、交易的定义	(176)
二、交易和制度	(177)
三、产权和法律的个体主义观	(179)
四、威廉森对交换的论述	(182)
第二节 对功利主义式计算的批评	(185)
一、迪尔凯姆与纯粹契约的不可能性	(186)
二、非纯粹契约的一些特例	(189)
三、非纯粹契约的重要性	(192)
四、信任述评	(196)
第三节 不纯粹原则和资本主义的命运	(197)
一、不纯粹性和笛卡尔思想	(197)
二、契约的不纯粹性：熊彼特和马克思	(200)
第八章 作为制度的市场	(206)
第一节 市场的定义	(206)
一、不易捉摸的定义	(206)
二、市场和制度	(207)
三、市场制度的类型	(210)
四、市场和交换	(211)
五、一些直接的理论结果	(212)
第二节 市场为什么会存在	(214)
一、交易费用	(214)
二、市场发育的限制	(216)
第三节 市场、价格和规范	(217)